

中國圖書文化的歷史價值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Chinese Bibliogenesis

來新夏

Lai Hsin-hsia

南開大學

Nankai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剖析和闡述中國的圖書文化，藉以明瞭中華文化傳遞的痕跡，並進而以中國的圖書文化作為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的搖籃。文中將中國的圖書文化分為製作、典藏、整理、流通、再編纂諸方面，提綱契領，探本索源，以史的觀點，敘述這些圖書文化的傳遞，鉅細靡遺，非但彰顯了中國圖書文化的歷史價值，也為中華文化的發展，發揮著「任重而道遠」的作用。

This paper aims mainly at analyzing and expounding the bibliogenesis of China so as to comprehend and trac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reby use the Chinese bibliogenesis as the backbon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For this purpose the Chinese bibliogenesis is systematically traced in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acquisitions, collections, circulation and re-compila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uch bibliogenesis is described roughly and in details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points.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values of the Chinese bibliogenesis are publicized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with profound and everlasting missions can be fulfilled as well.

中華文化的傳遞，在正式圖書出現以前，除口耳相傳外，傳遞記事方式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文字產生前所用的結繩、契刻和圖畫，以實物形象來記錄，可是傳遞困難；二是文字產生後，以甲骨、金石為載體，以文字記事來保存和傳遞文化，但它們缺少廣泛流通的圖書應有的功能，仍不是正式圖書。

中國的正式圖書應以周秦時期的竹木簡策為始，其後歷經帛書、紙書等等交錯和相承階段。它們承擔了兩千多年中國文化薪火相傳的主要職責。為了明瞭在這漫長行程中中華文化傳遞的痕跡，就需要比較全面地了解中國的圖書文化。

中國的圖書文化包含著圖書的製作、典藏、整理、流通，編纂諸方面。剖析和闡述這些方面

的成就，將會自然地顯示出中國圖書文化的歷史價值。

一、中國圖書的製作

中國圖書的最早專用載體是竹木，以竹為載體稱簡策，以木為載體稱版牘，也有以木作簡稱木簡的。據文獻記載，西周中期已使用，但未見實物。從出土文物看到戰國及秦的竹簡實物，證明二千年前中華文化的傳遞已有了正式的專用載體。竹木載體需經過去濕、防蟲以便書寫的炮製過程，製成長短不一的簡，分別記錄著政府法令，學者論述、大事記要和醫方等等。簡上的字用筆和墨寫的，刀是刊改誤處之用。每支簡自上至下寫二十到四十個字。秦簡有正反寫和分欄寫的。每支簡寫字不多，所以寫一個文件或一篇文章要用許多支簡，然後按順序編起來，用二、三道，甚至四五道絲繩或麻繩連成“冊”，以末簡為中軸，向右捲起來保存，這就是一“卷”書。版是木片，有不同規格，三尺長的稱“契”，二尺長的稱“檄”，一尺長的稱“牘”。寬是長的三分之一，一尺見方的稱“方”，寬度狹只能寫一行字的稱“札”，即木簡。戰國時多用竹簡，漢多用木簡。簡書在中華文化的保存、傳遞，奠基諸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從周秦到魏晉一直作典籍的主要形制；但是，由於製作過程繁複，攜帶流通不方便，收藏占用面積大，編連容易爛脫散落，所以與簡書並行的還有帛書。

帛是絲織品的總稱。帛書又稱縑書，縑書，與簡書並行使用，所以古書上說：“書之竹帛。”四十年代在長沙古墓發現2300多年前的帛畫，用三種顏色繪成各種神怪形象，還有文字。七十年代在馬王堆漢墓中發現大量帛書，約十餘萬字。帛書質地輕軟，書寫自如，剪裁方便，能繪圖製表；但帛價較貴，仍以至終不能完全取代簡書，直到紙書出現，它逐漸成為書畫藝術品的載體

。

簡書和帛書一直到東晉末年才被官方正式命令停止使用而由紙書代替。簡書和帛書的地位雖然被紙書所代替，但它們傳遞和保存中華文化的功績是光照後世的。

紙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它的發明使中華文化的傳播擺脫了竹簡的笨重和縑帛的昂貴而得到順利的流通。現發現最早寫有文字的紙是1973年甘肅武威發現的用隸書寫就的東漢古紙。紙的改進和發展應歸功于蔡倫。他總結經驗和提供了新的造紙原料，改進和推廣了新的造紙技術。東漢以來，手寫紙書逐漸趨向代替簡帛，三國時已較多用紙，帛成為貴重書寫材料。晉代用紙更為流行。“洛陽紙貴”的典故證明紙已成為商品。公元404年，桓玄正式下令廢簡牘改紙書。從此，中華文化的傳遞進入手寫紙書階段。晉紙寬約一尺，長尺餘。把幅度相等的紙黏連一起，由末尾向前捲，前後加簽和軸，形成卷軸式卷子本，二十世紀初在燉煌石室發現從四世紀到十世紀間手寫紙書二萬餘卷，中國現存萬餘卷。中國最早的紙書是流存在日本的《三國志》，虞翻，張溫，孫權等傳的殘卷。

從隋到唐前期，手寫紙書比較流行。直到九世紀前後，雕版印刷術發明和使用，印本紙書出現，冊裝形式流行，手寫卷軸紙書漸趨落後，但一直未完全取消。雕版印刷的出現，減輕了手寫的發動強度，縮短了成書時間，增大了複制量，降低了錯誤率，使中華文化的傳遞與傳播加速了進程和覆蓋面。

雕版印刷起于何時說法不一。但一種發明，往往有一個較長的醞釀成熟過程，要截然劃定時間比較難。根據文獻記載和已見實物，大致可定于唐朝。現存最早雕印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現藏倫敦博物館，國內最早雕印品是成都發現的《陀羅尼

經》梵文經本。唐代雕版印書主要是佛經和民間用書。雕印中心在四川、淮南等地。

五代從後唐至後周四代二十一年間曾刻印九經。石晉宰相和凝曾自刻所著書。十國也刻印圖書，蜀相母昭裔出私資刻書流傳。

宋為雕版書發展期，刻書範圍廣，刻書地區多，刻書量大，刻書技術水平高。從宋建國到真宗初（960-1005年）四十餘年間，國子監藏版由原來四千塊增至十餘萬塊，達二十多倍。宋初選用十二年時間刻成漢文佛經總匯—《開寶藏》，版片共十三萬塊。宋已有尤袤著《遂初堂書目》為版本目錄專著。實版書成為後世寶藏的珍品。

由于雕版印書出現，裝幀也由卷軸向冊葉過渡。冊裝書比卷軸本有易成、難毀，省費和便藏四大優點。北宋裝冊為蝴蝶裝，它以版心綫為準，將有字一面內折再把中縫背面粘于包背厚紙中線，展開時猶如蝴蝶雙翅，故名。蝴蝶裝是由卷軸走向冊頁的一種形式，也為後世的書冊提出了書型的初步規模。元、明流行包背裝，改把有字面外折，粘在包背紙上，但不裝訂，外形與今平裝書相似。明中葉後出現綫裝，即把包背裝的封皮從書背截開打孔穿綫，裝訂成冊，清代廣泛採用，至今已被人誤為綫裝書即古書的形態，而以綫裝書作古書的代稱。綫裝書的優點在於外觀整齊美觀，不易散亂，容易改裝，便于典藏。綫裝書是紙書中一種進步的型式。

印本紙書流行，并不等于手寫紙書絕迹；相反地，手寫紙書且日益崇貴。手寫稿本，鈔本、傳鈔本往往成為珍藏，各朝大型圖書亦以手鈔顯示其地位與價值，如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四庫全書》等。

不論手寫紙書，還是印本紙書，對於傳遞和傳播中華文化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國二千多年紙的歷史和一千多年紙書的歷史都充分證明中華文化之所以能源遠流長和對世界文化作出應有的

貢獻，確是其來有自。

雕版印刷由于版片笨重，雕版耗時費工、保管需用專庫，用久需不時修整，于是活字印刷便應運而生。活字印刷的出現，約在北宋仁宗（1041-1048）時，由名工巧匠畢昇所發明。他用泥製作字模，拼版印刷，比德國人谷騰堡的鉛活字早四百多年。可惜只有《夢溪筆談》的文獻記載，沒有實物成果，因此曾有人攻擊這只是設想，以泥活字不能印書來否定中國的活字發明。直至清道光間安徽一窮塾師瞿金生按畢昇方法製泥活字印書多種，方證明泥活字印書的可行性。元代王禎製木活字三萬餘字印《旌德縣志》，六萬餘字僅用一個多月印成百部，效率很高。明代活字印刷盛行，遍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雲南、四川，經史子集都有，鉛銅木並用而以銅活字著稱。清雍正初以銅活字印《古今圖書集成》萬卷，共一值六千多萬個字；乾隆時以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明代還創造了套印以及鉅版、拱花等技術。

雕版、活字、套印技術的發明使用為文化成果的保存和文化遺產的傳遞都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它為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發展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中國圖書的典藏

中國文化遺產豐富，在手寫簡書階段，惠施已有“學富五車”之譽，這反映了學者已有私藏；漢武藏書“積如丘山”，反映了官藏積累之富。根據古文獻推測，周以前可能已有主管藏書的人員。正式機構和人員是周的“藏室”和老子，所藏主要是各國史書，孔子曾去查閱過資料。諸侯國也多有藏書。

西漢懲秦焚書之失，鼓勵天下獻書，經過三次大規模徵集，藏書量達到13269卷。官藏機構有石渠閣、天祿閣、蘭台，石室等。而太史、太

常、博士也分別有藏。東漢藏書量比西漢增加三位，藏書機構有東觀、仁壽閣等七處。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置中國第一個主管文化典籍事業的正式官方機構—秘書監。

西晉初年館藏量有二萬九千多卷，後戰亂喪失。東晉初僅有三千多卷，後經五十餘年的努力，恢復到三萬餘卷。南朝梁元帝曾集書十萬餘卷，臨亡付之一炬。

隋朝二帝重視官藏質量，徵集鈔補，選精別藏。唐初由洛陽還書至長安，中途沈沒，損失慘重。經過几朝搜求，玄宗時已有八萬餘卷，設秘書省專管，進行大規模抄校工作，對唐以前的中華文化是一次總結性的檢閱，玄宗以後，國情不穩，典籍散亂，唐末官藏已不及萬卷了。

宋代注重文化，官藏中心有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和秘閣四處。藏書總量6705種73877卷。北宋末年損失殆盡，南宋逐漸恢復。南宋時書院發達，有二、三百處，都分別有藏書，成為與官藏、私藏鼎立的三大藏書系統之一，即書院藏書。

明代官藏空前豐富，宣宗時已達二萬餘種百餘萬卷，其中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可惜管理不善，政綱不振，至神宗時已“十不及一”了。

清朝為編《四庫全書》而廣泛徵書，官藏得到充實，先後建立七閣（南三、北四）。南三閣允許士人鈔閱，對傳播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書院藏書初期差，經康熙、雍正兩朝的恢復，約增十倍，這些書院都有藏書。

私藏是典藏的另一寶庫，周秦時期隨著私學興起而出現私人藏書。孔子等思想家及政論家為講學和發表政見，都需要參考典籍而可能有私藏，如蘇秦第一次游說失敗回家，就發篋中書以充實自己，後再度出游即獲得成功。西漢學者劉向、楊雄都有私藏。東漢蔡邕藏書量更大，已逾萬卷。三國魏人曹曾自建石室稱“曹氏書倉”，為私人圖書館之始。西晉學者張華遷居時“載書三

十乘”。范蔚藏書七千餘卷，全部對外開放，還供寒士衣食。南北朝學者任昉，沈約所藏均在三萬卷左右。

唐朝學者私藏萬卷以上者有十五、六人之多，吳兢曾為私藏自編《西齋書目》，柳仲郢私藏有質量不同的三種複本。鄭侯李泌藏書三萬卷，韓愈有詩句頌揚說：“鄭侯架多書，挿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有些藏書家吝惜所藏，不允借人，還在書上題語：“清俸買來手自校，小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其艱辛與用心可以理解，實固然不好，但出借還應是一種美德。

宋代私藏較盛，遍及邊遠和中原，少則數千，多則逾萬。藏者多為學術名家，宋敏求藏書三萬卷，每書均經三、五校；晁公武藏書二萬餘卷，自編《郡齋讀書志》；葉石林藏書多達十萬餘卷。

明代私藏集中江浙閩廣一帶，楊循吉（蘇州人）藏書十餘萬卷。王世貞（太倉人）藏書三萬卷，其中宋版逾三千卷。寧波范欽自建天一閣，藏書七萬餘卷。天一閣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建造，距今四百餘年，為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藏書樓，所藏明志271種，有65%已屬孤本。天一閣的規制和管理辦法至今噴噴人口。

清代著名藏書家，據一種統計有497人，占歷代總和的一半。很多人都是有成就的著名學者，如朱彝尊、黃宗羲、阮元、黃丕烈、盧文弨等。他們在完善自己藏書的過程中，發展了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等專門之學，對保護和傳播文獻都作出了貢獻。此外王府、地方衙署、書院、寺廟，書肆也都有藏書。

所有這些典藏設施編織成一整套典藏圖書的體系，使中國圖書發揮保存文化的功能基本上處于一種相對穩定的局面之中。



三、中國圖書的整理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正規整理圖書并實現分類管理的國家。約在公元前一世紀，漢代著名學者劉向便奉命承擔此一重任。分類思想和學術分類更早地出現于劉向之前，如荀子的“同則同之、異則異之”，韓非的“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和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等，對劉向的分類工作均有重要影響。

劉向父子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要目錄和綜合分類書目—《別錄》和《七略》。這兩部目錄是把古代分類思想應用於圖書整理的成果。它們是世界上最早的圖書分類法。

《別錄》是劉向按照圖書內容性質分成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類，分由專門人才主持。每書整理編定後寫一篇提要，這便成為中國古典目錄的主要形式之一。這是劉向對中華文化的重大貢獻。劉向在《別錄》接近完成之際，約在漢成帝綏和元、二年間（前7年）辭世。他的兒子和第一助手劉歆繼承其事業，除完成《別錄》外，還利用《別錄》資料，用了大約兩年時間撰成《七略》。這是一部系統的分類目錄，使官藏有所統紀，西漢以前的學術文化水平得到一定的反映。

《七略》除上述六類立六略外，並在其前加《輯略》。《輯略》具有總論性質而非獨立一類。所以中國圖書的最早分類法是六分法，比西方分類法早千餘年。

東漢著名學者班固受劉向父子影響，將《七略》加以剪裁和編次，寫成《藝文志》，列入所撰《漢書》作為專志之一，開創了在史書中列目錄的先例、形成古典目錄學中史志目錄體制。《漢書藝文志》按劉向六分法為六略，下分38種、596家共13269卷，前有一篇文字不長的總數，概

述了漢以前學術、漢初以來典籍收集情況，向歆父子的學術評價及《藝文志》的編纂緣由等，成為漢以前的學術大綱。由於《別錄》和《七略》早亡於唐、五代之際，《漢書藝文志》便成為查考古代文獻的文字依據。使後世能了解古代文化學術的基本面貌和古籍的存亡流傳。

魏晉以來，中華文化明顯地發展與豐富。佛經傳譯、五言詩、樂府詩、家譜，方志、起居注和文學批評作品紛紛出現，圖書整理工作趨于繁重。魏鄭默編《中經》，可能採用四分；西晉荀勗撰《中經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次序為經子史集，或為鄭默舊制。東晉李充正式確定甲乙丙丁即經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經史子集之名。南朝劉宋王儉撰《七志》、梁阮孝緒編《七錄》，成為分類中的七分法。

隋統一後整理圖書成績顯著，作了整理、增補、編目等工作。《大業正御書目錄》為其代表。唐初編成《隋書經籍志》。這是正式的經史子集定為類名的四部分類法中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它分經史子集四部，下分四十細類。四部分類至此確定，其排列順序和類名也都為後世所遵循。唐宋以下整理典籍，編制目錄率多依此。

宋承五代之後，圖書收集整理工作次第展開。仁宗時編定《崇文總目》，共66卷，分四部45類，各類有序，各書有釋，共收書30669卷，但元初已無完本，明清僅剩簡目。宋代私人整理工作頗值得注意，許多著名學者都做這項工作，著名的有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並稱私家目錄中的雙璧。

明初搜集圖書，南北遷移，直至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始整理編成《文淵閣書目》，形同登錄簿，不分經史子集，以千字文目排列所收古書，收書七千餘種。以祁承煥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編製較多的各類圖書目錄。祁氏更提出整理圖書的指導思想。

四分法影響後世最巨者為清《四庫全書總目》。這是一部篇幅巨大、體例較備、內容豐富和具有一定價值而為前所未有的名著。它按四部分類，下分四十四細類（經10類、史15類、子14類、集5類），共收書3461種，79309卷；存目6793種、93551卷。各部有總序，各類有小序，各書有提要。它對十八世紀以前的中華文化作了總結性的工作，也使四分法的地位益形鞏固。清代私人整理圖書工作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都有一套比較切合實際的程序和方法，人才眾多，成果累累，為圖書文化增加了光彩。

中國的圖書整理，從六分到四分，中間還有七分、五分等。這些分類法在不同時期發生過作用，但四分法一直是分類的主要方法。中華文化的豐富遺產正由于它而得到有次序的編排，易于典藏，便于拾讀，而代代相傳，綿延不絕。

四、中國圖書的流通

春秋時代國家藏書有範圍地開放流通，孔子曾到周的藏書室去查閱各國史書。戰國時期，思想活躍，著述流通很快，如秦始皇能讀到韓非著作而希望見其人，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與文化的廣泛流通有關。秦簡在雲夢的發現也說明官方文獻的流通。漢代學者間似已交換、借閱，賈誼、司馬相如、朱買臣、疏廣、楊雄等人都是博覽之士，無書不讀，當然不能全是個人私藏，而有互相流通的情況。東漢時書肆成為流通文化的一種渠道，如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荀悅也是如此。

當時圖書流通的手段主要靠鈔書，西漢時河間獻王曾組織人大量鈔書，東漢時有專門以鈔書為生的傭書人，班超“投筆從戎”的故事即反映了這一現實。魏晉南北朝時，如南齊庾護為營葬父母，鈔書“至于掌穿”，南梁沈崇素“傭書以

養母”。有些人在鈔書過程中充實了自己，成為大學者，如東晉和尚僧肇，早年因傭書，“歷觀經史，備盡文籍”，後來成為譯經活動中的主要人物。有的以鈔書致富，如北朝的劉芳因鈔書而改變了家庭“窮窘”的處境。

魏晉以來還開展對國外的交流，三國孫吳曾派康泰等人到過東埔寨，不僅傳播中華文化，還把其經過的國家，地區的見聞寫成《扶南異物志》傳回來。這種中外文化的交流對中華文化發展有融合推進作用，據《隋志經籍志》著錄，當時介紹國外情況的書已有數十種。中華文化較早地傳到朝鮮和日本，西晉時《論語》傳到日本，南北朝時《千字文》和《五經》都經朝鮮傳到日本。兩國受中華文化的影響頗大。

佛經的翻譯促進了中國與印巴次大陸的文化交流。當時來中國譯經的印巴次大陸僧徒七十多人，中土僧徒去的也有八、九十人，其中貢獻最大的是東晉的法顯。他歷時十四年，西行至印度，游歷三十國，寫了著名的《佛國記》。這是一本研究印度和南海各地的地理、風俗和宗教的重要資料，已譯成英法等國文字。

唐朝因雕版印書流行，文化交流面較廣，傳播速度較快。江南，四川一帶已刊印一些民間通俗讀物流行。唐朝中外文化交流頻繁，長安已是國際性城市。交流對象主要是日本、朝鮮和印度等國。日本曾派正式使團十三次來長安，每次百人以上。據日本九世紀末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載，當時日本所藏漢籍已達1979種，16000餘卷，其中有3000卷左右的科技書，如《神農本草》、《千金方》等均在此時傳入。白居易的詩傳入新羅，也受到歡迎。唐高僧玄奘，義淨等對中印文化交流的貢獻很多。尼泊爾、斯里蘭卡和阿拉伯國家也都與唐朝有文化交流關係。

宋朝的官私所藏圖書都按一定範圍開放，官藏圖書還訂有一套借閱制度。對遼、金、西夏雖

採取封鎖政策，但仍被高價買走。遼、金西夏則儘量從未獲得圖書以汲取漢文化，他們的翻譯漢籍活動很積極，對中華文化的融合有重要作用。

明朝刻書興盛，在北京、南京、蘇州、杭州形成了圖書市場。譯西書活動以利瑪竇為代表而開展，為中華文化增添了新內容，是中西文化融合吸收的開端。明代圖書輸出較多，派使出訪帶有圖書作禮物，來訪者也被賜贈圖書。

清朝前期的市場交流為傳播圖書的主要方式，私人間的借閱和傳鈔是有補充作用的。南北二京和蘇杭兩地仍是圖書交流中心，如北京琉璃廠有數十家書肆，學者經常光顧，甚至就近租屋訪書，創造了學者間交流的機會，使琉璃廠在近三百年來成為流通圖書傳播文化的中心之一。私人間也互通有無，一些著名藏書樓成為主要借書對象。

清朝後期，由於西方和日本的思想文化傳入，一些來華的西方人士又大量翻譯西書，加速了中國與東西方外來文化的交流。私人圖書的開放度更加擴大，如浙江紹興古越樓的對外公開借閱，出現了為社會服務的趨向，文化傳播更為迅速。

從古以來，中華民族通過不同的交流渠道與手段，對國內外的各種文化進行吸取，選擇和融合，使本身日趨豐富。中華文化的不斷完善和更新給圖書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營養，圖書文化也以其特有的形式顯示中華文化的光輝，保存、傳遞其優秀成果。

五、中國圖書的再編纂

圖書的數量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日益增多，對弘揚中華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給收藏、閱覽和翻檢卻帶來不少困難，於是從魏晉以來就出現類書、叢書等的再編纂活動。

首先出現的是編纂資料匯編式的類書。最早

的類書是魏文帝曹丕敕撰的《皇覽》。這部由五經群書輯成的類書，有四十餘部千餘篇八百餘萬字，雖全書早已亡佚（清有輯本）；但却開後世官修大書之端。自此以後，類書日益發展，可分三期：

六朝到唐是創始期。南梁有《壽光書苑》和《華林遍略》南齊有《四部要略》，北齊有《修文殿御覽》，對後世多有影響，然大都限之於匯集辭藻，搜求典實。至唐朝有供為政者參考之書者如《北堂書鈔》、《群書治要》而《藝文類聚》之整篇收錄更起到了保存文獻的作用。《初學記》篇帙不大，選錄較精，檢索尤便。

宋是類書的發展期。《太平御覽》是宋太宗主持編纂的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大類書，歷時六年餘，全書千卷，分55部5426類，內容包羅萬象，有天地人事，州郡職官，禮儀治刑，工藝器物，神鬼妖異等類，引用資料達1600餘種（一說2580種左右），其中十之七八兩宋時已流傳甚少，是保存宋以前文獻最多的一部類書；但引用書名多有錯亂異名，誤鈔難懂等不足之處。另一部千卷大類書是《冊府元龜》，成書於真宗朝。它從大量圖書中搜集可供政事借鑒的資料而編成。此書由於作用多為常見書，且又不注出處，一直不受人重視，直到近代始被文獻學家陳垣教授所注意，認為它所收史書都是北宋前古本，可作補史，校史之用，此書遂增高其使用價值。

明清是類書的興盛期。明成祖所編《永樂大典》是一部篇帙浩繁的大類書，歷時六年，人員二千餘人，采錄典籍八千餘種，共成書達22877卷，三億多字。清朝學者從中輯錄多種古佚書，而有關農業、手工業、科技、醫藥諸種有益資料也大量收入，不愧稱中華文化的轉輸寶庫。可惜屢遭劫難，今僅存八百餘冊。

清朝類書體例之精，種類之多，規模之盛，檢索之便，多超越前代。《古今圖書集成》當為



代表作。《古今圖書集成》共萬卷，一億六千多萬字，分類比較完備，搜羅比較宏富，又收錄整篇整段，並注明出處，成為輯佚、校勘的重要史源；但有鈔寫脫漏，隨意節錄之弊。其它如《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等，都是便于檢索、有利用價值的類書。

類書在保存和傳遞文化上有著重要作用。人們可以通過一部類書接觸到更多的書，並且由于分類鈔撮而便于省覽檢索；但它又因輾轉相遞而有訛誤，因此使用時應注意，類書可作輯佚書的資料來源，但切忌用類書引文而亂改存世古書。

叢書是將若干種圖書編集在一起的圖書再編纂方法，頗便于收藏與利用。南北朝的匯集地記、宋初之刊印開寶藏以及綜合性叢書《儒學警悟》及《百川學海》，皆為開端之作。叢書雖起源較早，而明清兩代始稱盛，包羅閎富，其能跨越前代，馳名中外的，當推至今存世的大型綜合性叢書《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創意于乾隆三十七年，經過搜求整理、編次繕定，直至乾隆五十二年全部告成，歷時十五年之久。共收書3461種79309卷，使許多有極高文獻價值的珍本秘籍呈現于社會，為後世學者研究古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保存和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與傳遞及許多與整理文獻相關的專門學科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四庫全書》是中國圖書再編纂事業中的一項重要成就。

民國以來，叢書較多，主要以《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和《叢書集成》為代表。

叢書的總數無確切統計，1959年出版的《中國叢書綜錄》收書2797種，尚不包括佛學和新學叢書在內，估計當在三千種以上，其數量不可謂不巨，加以內容收羅宏富，涉及門類廣泛，很有參考價值。一部叢書往往匯聚多種圖書，比求單刻容易。叢書以類相從，往往能得到同類多種圖

書，有些所收底本較好亦可用作校勘之需；但也應注意到有些叢書往往追求所收種數或為各書分量平衡而有所刪節，所以要明辨使用，趨益避害。

六、結語

中國圖書文化的發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毫無險阻的。秦始皇焚書就是統治者摧殘圖書文化的惡例。歷代的兵火變亂和改朝換代也都給圖書文化造成了厄運，因而有隋牛弘“五厄”、明胡應麟“十厄”的概括，以至清朝對圖書的禁錮，都對中國的圖書文化產生了消極作用。但是，中國的圖書文化在艱難的歷程中對傳遞中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啓迪人民的智慧和開展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諸方面，無疑都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視的歷史價值。

1992年2月初稿

1993年4月增訂稿

〔作者簡介〕

來新夏，中國浙江省蕭山市人。1923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6年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歷史學系，1949年為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范文瀾教授研究生。從事中國近代史，古典目錄學及中國方志學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四十餘年。現為南開大學教授。曾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學情報學系主任，南開大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現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地方文獻研究主任。在全國性學術團體中的職務有：全國高等院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委員，中國地方志協會理事。自1985年以來曾先後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普林西頓大學，俄亥俄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校訪問，講學。1991年秋應日本獨協大（下轉36頁）